

那些因后人“嫌弃”而更改的宁波地名

宁波地名谭

徐雪英

不久前，土耳其将英语国名“Turkey”改成“Türkiye”。很多人表示理解，因为“Turkey”这个英文，有火鸡、失败等义，确实让人嫌弃。

如此遭人嫌弃的，还有很多城市的一些早期地名。这些地方初期大都僻远，由底层居民命名，风格直白粗野，市井气息浓厚，有的因遭后人嫌弃而更名。

象山南田岛西海岸有鹤浦镇，地处鹤浦平原水网地带，为宁波唯一海岛港口城镇。镇域多丘陵、山、海、滩、礁融于一体，别具风情。镇以原鹤浦渔村得名，渔村地处今鹤西路与南田路一带。

清道光中期，温州、台州20余户移民来此搭寮垦种，渐成聚落。因村北港边有一山丘，早期居民认为很像在海边啄食的鸭嘴，取名鸭嘴头，村以山名。鹤浦镇上的鸭嘴头街、鸭嘴村等为其派生地名。

随着村镇的日益繁华，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新打量这座形状有趣的山丘，觉得初民先辈把它比拟成鸭嘴有些草率，应该比拟成一只亭亭玉立于象山港畔的美丽仙鹤，故易鸭嘴头为鹤浦。

鹤浦东南有黄金盘，沿樊岙港南岸散状分布。清同治年间，卢姓先祖从临海迁居山下。蔡、陈、张、谢等姓随后陆续迁入。村西南有一孤山，早期居民认为它形若村中的黄狗卧卧，故名黄狗盘山。村以山名，亦称黄狗盘。后代子孙同样嫌弃先祖们的直白，用谐音的方法易名成现今的黄金盘村。

象山涂茨镇有毛湾，地处象山港畔山坳内。清乾隆末期，张姓先祖由鄞县迁此定居，沿山麓繁衍建村而成。村东偎海湾，湾内有一岬角向东凸出，形似一只趴着的猫头，故名岬角为猫头嘴，名海湾为



猫湾。村以湾名，亦称猫湾。

估计后代子孙介意被别人误会住在猫窝，故谐音成毛湾。毛湾分上、下两村。上毛湾地形较高，沿炮台山东麓长条形分布；下毛湾分析于上毛湾，沿庙龙山上麓块状分布。下毛湾村内有巨石，传为康王赵构登马之所，别称上马石。

二

像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直白粗浅地名，在宁波早期地名中还有不少，它们用特殊的视角展示着浙东沿海丘陵地区早期民众的世俗生活，记录着这块土地上底层民众生活的琐碎与纠葛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异，这些地名大多因过于粗鄙而发生演变。

奉化溪口镇有兰田，地处四明山腹地，海拔约600米，为宁波高山村落之一。兰田主居王、阮两姓，传300多年前由王上山迁居而成。兰田群山环村，溪水绕所，生活其中，如居红尘之外。如此佳处，用“烂田”命名太过委屈，后人遂讹化为幽香袭人的“兰田”，也曾作“岚田”。地方文献记载，

抗战时期，此地曾是新四军浙东“三五支队”战斗之地。

鄞州塘溪镇有华塘，地处象山港之滨。清顺治年间，陈、程两姓分别从姜山和程家坝迁此发族。村前原有海塘名爬塘，村以塘名。随着象山港洋面的渐行渐远，村前需要人弓着背爬上爬下的海塘也拆毁不见。为适应爬塘一带繁庶的新面貌，后人改“爬”为“华”，易名为大气的“华塘”。

慈溪长河镇有辉弄，地处杭州湾南岸，约北宋年间成陆。明代起，有先民在此筑海塘御海涛，由南向北熬盐垦殖，逐渐衍成村落集市。传早期先民居此煮盐时，常常满屋满弄都是烟灰，故自嘲为“灰弄”。艰难稼穡数百年后，这里终成屋舍林立、人流如织之地。为表示今非昔比，后人雅化为窗明几净的“辉弄”。

海曙区政府附近有老实巷，原称牢城营巷、牢舍营巷，是古代宁波城内囚禁犯人之所。《水浒传》中林冲被押解到沧州牢城营时，牢城营要按照太祖武德皇帝旧制打他一百个杀威棒，幸亏有柴进的书信和银子打点，才称病逃脱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宁波清代地图《宁郡地輿图》显示，清代时宁波牢城营附近还有萧王庙。《延祐志》解释：“此处旧有佛阁，乃行刑之地。因立鄞侯庙云。”表明此地即是古代宁波

城内监牢之地，也是行刑之所。后人可能嫌其阴煞，谐音成太平祥和的“老实巷”。

三

因阴煞而被后人更名的还有一些墓祭类地名。我国古代长期流行土葬，名门望族又多厚葬，留下不少坟墓祭坛类地名。

象山石浦西南有文旦港，原名坟坦港。清咸丰年间，由刘、金、石三姓先祖从平阳迁建而成。村附近山麓有一大墓，为石浦叶姓所建。大墓占地约200平方米，墓前设坟坛。因名坟坦港。谐音坟坦港。后代子孙觉得“坟”字吓人，继续谐音，便成如今的“文旦港”。

鄞州下应有史家码，原名史家墓，村民主姓史。南宋时期，迁鄞始祖史维则的曾孙史翰从宁波城南迁此发族。史翰殁后，筑墓于大字港畔，故名史家墓。清初也被后代用方言近音谐音化为史家码。

宁海桥头胡街道有贵人坛，村处铜岭岗南山山边。《天台金氏宗谱》记，明万历年间金氏从天台带横迁此建村。戚继光抗倭时，十里筑一墩（烽火台），五里建一坛（鬼神坛）。此地便为鬼神坛所建地之一。后人以“鬼”为“贵”，“神”为“人”，改阴风阵阵的“鬼神坛”为明媚喜气的“贵人坛”。

落难公子中状元

老话新聊

桂晓燕

“落难公子中状元”这句宁波老话，表达了旧时读书人希望通过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理想，也是许多传统戏里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。

老宁波熟悉的越剧《珍珠塔》，就是一个“落难公子中状元”的典型。方卿因家道中落，从“高富帅”沦为穷光蛋。有心赴京城赶考，怎奈盘缠钱无从着落。为此到姑妈家借钱，不料被姑妈百般奚落，钱没借到，气倒吃饱。表姐陈翠娥爱方卿有志有才，赠他传家之宝珍珠塔，鼓励他发愤图强。方卿不负表姐厚望，果然翰官折桂，状元及第。以前遭的穷、受的气、倒的霉，统统烟消云散。不但和陈小姐喜结良缘，而且扮成道士唱道情，将姑妈回敬一番，大大地扬眉吐气。

传统戏里的状元，几乎个个是风度翩翩的年轻帅哥，常被皇帝招为驸马。然而，戏剧毕竟是戏剧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自从隋朝创建科举制度，一直到清末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，1300年来，有记载可考的驸马状元，只有一个，名叫郑颖，唐宣宗将长女万寿公主下嫁给了他。

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，大致上经历了从世袭制、察举制到科举制的演变过程。夏商周三朝实行的是世袭制，不看才能只看血统，出身豪门世族才能当官，寒门子弟难以出头。这种制度最不公平最不合理，相当于最大的制度性集体舞弊。西汉开始出现了察举制，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进行考察，选取人才并向上推荐，那就要看地方长官的眼光和品德了。起源于隋朝的科举制，是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。它打破世族门阀垄断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，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相对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。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中国1300年科举史上，共产状元600名左右，其中我们宁波有状元13名。

宁波的第一位状元张孝祥，人称“甬上第一状元”，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。张孝祥，鄞县桃源乡

人，南宋豪放派词人翘楚，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年）殿试第一。这年科考，是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科考。考生中人才济济，名家如云，如大诗人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等，竞争异常激烈。年方23岁的青年才俊张孝祥，不但力挫群雄，更关键的是，他击败了权倾朝野的奸相秦桧的孙子秦垧。

秦桧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孙子，竟会失掉早已内定的状元桂冠。他知道秦垧的最大对手，是才高八斗、名满天下的陆游。为此秦桧放了一个毒招，指使主考官在礼部主持的省试（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会试）中，直接将陆游淘汰出局。这样一来，秦桧以为自己的宝贝孙子，就天下无敌了。于是在省试的榜单上，秦垧窃居第一，张孝祥第二，一个名叫曹冠的第三。

人算不如天算。在接下来的殿试中，宋高宗看到推荐上来的前三名试卷中，第一名的言论跟秦桧的如出一辙，毫无新意；看到第二名，眼前一亮，不由得拍案叫绝！洋洋洒洒一万四千字的策论，不但文采飞扬，酣畅淋漓，针砭时弊，振聋发聩，而且书法极佳，有大书法家颜真卿之风。宋高宗毫不犹豫，将张孝祥点为头名状元，曹冠榜眼，秦垧为探花。

这是南宋历史上最霸气的状元，也是宁波最霸气的状元！

科举制诞生后的初期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进步性，尤其是唐宋两朝，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才，如繁星满天，熠熠生辉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由于统治者推行八股文等种种原因，科举制度逐渐僵化，显现出诸多弊端，被世人诟病。

虽然科举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是科举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。据传，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，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。而今世之高考，尽管存在一定问题并受到各种批评，但是人们迄今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。所以，同学们还是要积极对待考试，包括高考。当然，如果已经尽力了，而未能金榜题名，也不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。比如名落孙山的爱国大诗人陆游。

温故

靳小倡

“一山突起丘陵陵”，确乎是一种为害已久、至今不绝的病症。当然，也激起了各种各样对付嫉妒的反抗，尽管巧妙各有不同。

早一点的例子，可举孙臆装疯。当他看清庞涓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居心后，便开始装疯，胡言乱语，嗜粪。在猪圈里滚爬。一个疯子还能有什么作为？孙臆逃出生天，庞涓终于于惨败。还有刘备装傻。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的时候，他若不是装出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，而是使性逞气，曹操就不可能放过他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足鼎立。

孙臆、刘备对付嫉妒的策略，姑且称之为“掩饰法”。你不是怕我强吗？我就“弱”给你看。幽默大师侯宝林“文革”时挨批斗，被押到台上，台下狂喊：“打倒黑帮！”只听台上咕咚一声，侯宝林自己躺下了，“别费事，我自己倒下算了！”弄得红卫兵哭笑不得。

这种自行“变弱”，以免招来打击的办法，当然很聪明，但需要较深的城府，不怕丢面子。这对许多人来说，往往是难以做到的。因此，对付嫉妒的办法，也是大不一样的。

屈原志行高洁，却受到“兴心而嫉妒”的贵族群攻击，终至被流放。他不甘受辱，纵身汨罗，临死时仰天长啸，《离骚》名世。他这种将美好自行毁弃，展示给人看的

“妒害”是一种病

“以身明志法”，对后世影响极大，许多遭嫉而难以自拔的才俊，常常走上这条路。

不满于嫉妒的重压而自杀，以期表明心迹，恐怕是当事者的初衷，效果如何实在难说。先不提还有那么多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的麻木看客，仅就一些造成悲剧的嫉妒者来说，也未必能使他们良心发现，改邪归正。

“一忍可以支百勇”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不少人提出这样的治妒良方。自然，也有成功的例子。

物理学家法拉第的老师戴维学识渊博，治学严谨，是他发现了法拉第并招入自己的实验室工作。此后，戴维却嫉妒起学生来，不近情理地折磨法拉第。对此，法拉第并没有“以牙还牙”或是决绝而去，而是咬紧牙关忍受，终于感动戴维，使他改变态度，并热情推荐法拉第进入皇家学院。

这似乎可以说明“忍”的成功，但千万别忘了，戴维并不是那种一妒到底的人，还有受感动的良知。倘若不是那种“咬”起人来不松口的角色，一味地“忍”，无异于姑息养奸、纵虎为患。

有时候，嫉妒也像弹簧，“你强他就弱，你弱它就强”。唐代的韩愈与有识同仁一起倡言改革，鼓吹“师道”，本是很有积极意义的

举动，却受到权臣庸吏的忌妒。韩愈当仁不让，写了《朋党论》《师说》痛加驳斥，别人也奈何他不得。

“硬碰硬”的办法当然淋漓痛快，弄得好，见效也快。但必须有两个条件：被嫉妒者要有一定实力，能够旗鼓相当地对阵；被嫉妒者的上司得是明白人，否则，一旦是非需要仲裁，胜负就难有把握。

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韩非，因才识超群，遭到同出一门的李斯嫉恨，韩非是敢于“硬碰硬”的，声言不怕昏君权臣，官司打到秦始皇那里。始皇听信李斯谗言，杀了韩非。

既不想以身殉志，也不愿委曲求全，又没有“硬碰硬”的条件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“躲”，拂袖而去，一走了之，做一个“通塞由天”的“达人”。

何谓“达人”？无外乎浪迹山水间，“散发弄扁舟”；或者是把脑袋扎进酒坛子里，来个“长醉不复醒”。一生傲岸，为“苍蝇贝锦喧谤声”所苦的李白就是这干干的，使得后人争相效仿。但这种“逃避法”，说着容易做起来难，若不修炼到“心死”的程度，是学不来的。即使是高吟“浮荣何足惜”的李白，又何尝算得上真正“毕业”！假使性格再认真、执拗一点，就更加难见效果。

贾谊遭忌，被贬长沙，虽说是贬，毕竟头上还有一顶“长沙王太傅”的乌纱帽，生活不至于穷困潦倒。况且，长沙风景不错，自可做啸山林，但他终究没咽下那口闷气，30多岁就郁郁而终。伤及心髓的妒火灼痛，仅靠“达观”是很难排解掉的。

嫉妒，几乎是一切杰出人物都会遭遇的磨难。鲁迅也常常为这种不期而来的黑箱所苦。他与许广平的爱情，就使得一直害着“单相思病”的“狂飙文人”高长虹妒火中烧，对他大肆攻击。对于这类行径，鲁迅虽有过后与此辈争辩，将会“一事无成”的慨叹，实际上，他是认真对待的，态度也非常明确。

首先，他不赞成自杀，“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，服毒、悬梁是不来的”；其次，是不怕，“倘使顾忌他们，他们更要得步进步”，主张“不留情面”“拳来拳对”，即或比对手“刻毒”也无妨；第三，细做查证，讲究策略。它曾幽默地说，与持“粪帚”的人对骂，不可莽撞从事，弄不好，即使打了胜仗也会溅自己一身污秽。不妨先静观其表演，待到出现破绽，再“徐徐扑之”。

鲁迅对于“妒”的反击，愤慨而不乏冷静，猛烈中见柔韧，坦荡中见机锋，不辩则已，辩则必明，确实很高明。

读史

顾科明

镇海两座古桥，有段值得品读的家族史

九年(1839年)的《蛟川黄氏本派草谱》，才知道这座古桥，与其上游1000米已经拆除重建的庶来桥，背后有段值得品读的家族史。

庶来桥始建于宋咸淳五年(1269年)或六年(1270年)，建桥人为黄麒，字麟孙；黄杨桥始建于元至正十三年(1353年)，建桥人为黄杨，字春卿。两人父子关系。

父子两人连续在家族聚居地建桥，造福百姓，也让蛟川黄氏后辈，把这种心系桑梓、勇于任事的基因发扬光大。

后人黄廷议(1766年-1832年)，十四岁遵父命弃学从商后，虽家仅中产，然天性好义。嘉庆二十年(1815年)镇海赈饥，因组织不当，有人死于践踏。黄廷议建议按户授牌，依牌分场给粥，秩序井然。二十五年(1820年)，有饥民不守规矩出手抢粥，官员欲置之法，黄廷议知道后，表示“愚民何知困于岁复困于法耶？减勿校”。为首者得知后，焚香谢罪，黄廷议慰而遣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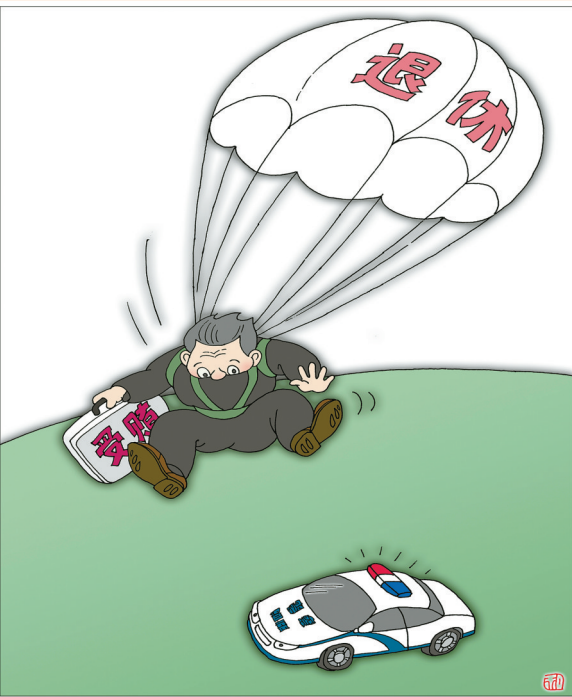
黄廷议的儿子黄溥(1793年-1865年)，1841年英军犯定海，他在

镇海募乡勇四百人守城。次年英军再犯镇海，久之粮绝，黄溥没有放弃，一边上奏拨款救粮，一边想别的办法，坚持抵抗。

当时的定海县(今舟山市)大儒黄式三，称赞黄廷议“贾其身、儒其心”。什么是贾？就是努力做大自己的资源。什么是儒？就是要求有足够条件的人，能够践行超越自身私利的价值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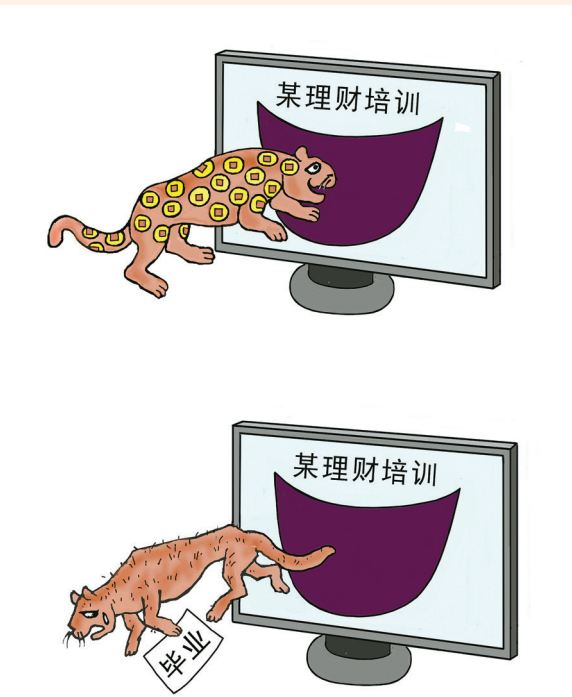
这其实也是宁波商帮的底色。蛟川黄氏虽非大族，却能长期践行儒的精神，更加说明家风之淳，乡风之正。

漫画角



着陆点

王祖和 绘



「培训」后

于海林 绘